



中国共产党史稿

柳建辉 主编

第⑧卷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1956.9—1966.5]

沈传宝 李 林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史稿

柳建辉 主编

第 8 卷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共产党史稿·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1956.9~1966.5 / 柳建辉主编；沈传宝，李林著。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6
ISBN 978—7—220—08352—5
I . ①中… II . ①柳… ②沈… ③李… III . ①中国共
产党—党史—史料—1956~1966 IV . ①D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07153 号

ZHONGGUO GONGCHANDANG SHIGAO
中国共产党史稿 (第 8 卷)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1956.9—1966.5]

柳建辉 主编
沈传宝 李林 著

策 划	解 伟
责任编辑	王 茵
装帧设计	杨 潮
责任校对	何秀兰
责任印制	李 剑 孔凌凌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槐树街 2 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scpph.com http://www.booksss.com.cn E-mail: scrmcbsf@mail.sc.cninfo.net
发行部业务电话	(028) 86259459 86259455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 86259524
照 排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27.25
插 页	3
字 数	420 千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0—08352—5
定 价	580.00 元 (全套共 12 卷)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624

目 录

第一章 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和探索的良好开端	(1)
第一节 《论十大关系》和“以苏为鉴”思想的提出.....	(1)
第二节 向现代科学进军和“双百”方针.....	(8)
第三节 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20)
第四节 党的八大及其探索成果.....	(30)
第五节 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和“一五”计划的成就.....	(44)
第二章 全党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55)
第一节 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创立.....	(55)
第二节 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	(62)
第三节 整风的转向与反右派斗争的开展.....	(77)
第四节 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及其后果.....	(85)
第三章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93)
第一节 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93)
第二节 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热潮和大办人民公社.....	(104)
第三节 全民动员大炼钢铁.....	(112)
第四节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122)
第五节 各领域的“跃进”热潮.....	(131)
第四章 党对“左”倾错误的觉察和纠“左”的努力	(145)
第一节 “左”倾错误的初步发现和纠正	(145)

第二节 人民公社的初步整顿.....	(157)
第三节 调整生产指标和改善人民生活.....	(170)
第五章 从庐山会议前期纠“左”到“反右倾”斗争.....	(182)
第一节 庐山会议前期继续纠“左”	(182)
第二节 彭德怀的忧虑与会议方向的逆转.....	(189)
第三节 全党范围的“反右倾”斗争.....	(195)
第四节 继续“大跃进”及其严重后果.....	(201)
第六章 国民经济调整的重大决策及其初步实施.....	(209)
第一节 中央的读书活动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思考.....	(209)
第二节 “紧急指示信”和“农业六十条”	(224)
第三节 调整方针的制定与贯彻.....	(233)
第四节 科学、教育及政治关系的调整.....	(245)
第七章 进一步调整与国民经济的复苏.....	(253)
第一节 “七千人大会”和对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	(253)
第二节 西楼会议与全面调整方针的确立.....	(263)
第三节 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和对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探索.....	(267)
第四节 政治关系及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	(274)
第五节 平定西藏武装叛乱与西藏自治区的成立.....	(280)
第六节 民族政策的调整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	(288)
第八章 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中期中国的对外关系	(298)
第一节 炮击金门与中美关系的演变.....	(299)
第二节 从分歧走向分裂的中苏关系.....	(311)
第三节 中国周边形势的变化与坚持和平外交政策的努力.....	(323)
第四节 争取“两个中间地带”	(340)
第九章 国民经济调整任务的完成.....	(350)
第一节 “再用三年调整”的决策及其进展.....	(351)
第二节 试办托拉斯和两种劳动教育制度的改革尝试.....	(357)
第三节 “三五”计划的编制与三线建设的开局.....	(368)
第四节 “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的提出.....	(378)
第五节 全面调整的完成及十年建设主要成就.....	(385)

第十章 政治上“左”倾错误的再度发展	(394)
第一节 八届十中全会.....	(394)
第二节 “四清”和“五反”运动.....	(402)
第三节 党内的政治批判.....	(410)
第十一章 意识形态领域的过火批判	(415)
第一节 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	(415)
第二节 批判“有鬼无害论”.....	(419)
第三节 哲学界、经济学界、历史学界的批判.....	(424)

第一章

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和 探索的良好开端

1956年是我国政治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次重大转折。中国共产党的注意力开始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在国内国际形势产生变化的背景下，摆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紧要课题是，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吸取苏联的经验教训，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一样，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从1956年初开始，党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探索，并取得了良好的开端。

第一节 《论十大关系》和 “以苏为鉴”思想的提出

一、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发表

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起来。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都相对落后的国家，在这样一个国度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对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事实已经证明，中国革命道路不能照搬外国的经验。同样，搞

建设也不能照搬外国的经验。那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并借鉴苏联的成功经验，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缺乏经验，中国共产党曾号召向苏联学习。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下，经过两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业大国。1953年同1913年相比，苏联工业总产值增长了20.43倍，国民收入增长了12.67倍。苏联在帝国主义包围下不仅成功地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取得了巨大成绩。苏联作为成功的先例，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学习的榜样。自1949年6月以来，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都访问过苏联，并参观了苏联的工厂和农场，目睹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更加坚定了学习苏联经验的信心：“苏联经济文化及其他各项重要的建设经验，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全党全国普遍地开展学习苏联经验的运动。既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又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既学习苏联如何建设工厂企业，又学习苏联开展文化建设的经验。总的来说，各行各业，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部门都在学习苏联，按照苏联模式进行建设，或者改组。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经济和教育这两个部门。就经济部门来看，从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到企业的建设和管理，基本上都是苏联那一套。工业、农业、商业都在学习和采用苏联的经验。从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方针到各项具体政策的制定；从国家如何制订计划到中央和地方应该建立哪些经济管理部门，以及如何管理；从建立财政金融制度到如何开展对外贸易，甚至连企业的设计、设备安装和农作物的管理方法，都以苏联为榜样。在那个年代，中国绝大多数人都不会怀疑全面学习苏联有什么不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许多方面学习苏联经验，虽然是必要的，但毋庸讳言，在学习中存在着盲目性，对斯大林和苏联模式存在一定的迷信。苏联模式在它建立的初期曾发挥了巨大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它的弊端逐渐地暴露出来。赫鲁晓夫上台后对这种高度集中的体制进行了

改革。同样，中国在模仿苏联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后，也暴露出了弊端。

从 1955 年底开始，为了更准确地了解国家经济的情况和准备党的八大召开，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工作。1955 年 12 月至 1956 年 3 月，刘少奇听取了中央和国务院 30 多个部门的汇报。接着，从 1956 年 2 月中旬至 4 月下旬，毛泽东用一个半月的时间分别听取了中央和国务院 34 个部（委、办、局）关于工业生产和经济工作的汇报。4 月下旬至 5 月 2 日，他还邀请湖北、广东两省和武汉、广州两市的党委负责人开了四次座谈会。在调查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一些对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问题。

1956 年，也是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多事之年。就在毛泽东听取 34 个部委汇报的过程中，苏联共产党于 1956 年 2 月 14 日至 25 日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报告，对现代国际局势发展中的根本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新观点。在国内问题上，报告强调恢复和加强列宁的“集体领导”原则，坚决反对个人崇拜。大会通过了赫鲁晓夫的报告。在会议闭幕前一天即 2 月 24 日深夜，赫鲁晓夫向代表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这个报告突出地批判了个人崇拜，指责斯大林滥用职权，违背集体领导原则、破坏社会主义法制，使肃反扩大化，此外，还提出了斯大林在农业、卫国战争、国内民族关系和对外政策等方面的一系列错误。苏共二十大，尤其是对斯大林的批判，在国际上产生强烈的反响。西方帝国主义者乘机掀起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发生信仰危机，大批党员纷纷退党。在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由于长期照搬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和经验，片面强调重工业的发展，而忽视农业、轻工业，使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下降，加上没有处理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关系和矛盾，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在苏共二十大影响下，这种不满情绪日益加剧。6 月，波兰发生波兹南事件，工人罢工、群众上街游行示威并出现骚乱。10 月，又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在布达佩斯等地出现大规模罢工、游行示威，在外国敌对势力的插手下，导致暴力活动升级。所有这些严重

事件使人们的思想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混乱，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巨大困难。

针对国际形势特别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于4月和12月先后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阐明了自己的原则立场。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肯定苏共二十大对个人崇拜的批判，表示坚决反对教条主义，主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同本国、本民族的社会历史状况相结合，对于苏联的一切经验，别的国家不应该原样照抄。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驳斥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对派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论述了如何全面客观地看待无产阶级专政下所犯错误的问题。特别指出“斯大林尽管在后期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他的一生仍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家的一生”^①，不同意全盘否定斯大林，认为这样做是帮助了敌人。

虽然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的一些严重错误特别是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混乱，但这次大会也有其一定的积极作用，这就在于使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摆脱了斯大林的某些教条主义和僵化思想的束缚。于是，在毛泽东听取“汇报中同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相关联的事也多了起来，‘以苏联为鉴戒’的思想更加明确了”。^②作为这次调查的结果，毛泽东总结成十个问题（即十大关系），在4月25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又作了进一步阐述。毛泽东所写的《论十大关系》，被称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篇之作。

二、“以苏为鉴”思想

《论十大关系》的发表就是“以苏为鉴”的结果。毛泽东曾这样说过，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

^①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

^② 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89页。

心情不舒畅。^①中国毕竟有自己的特点，苏联的方法不可能完全适合中国。1956年前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对苏联模式进行认真反思，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揭示了苏联模式的弊端，不再迷信这一模式；其二，反对不加分析地照搬苏联的经验，强调学习苏联经验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论十大关系》^②的发表，就是中国共产党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端。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他强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所谓引以为戒，就是以苏为鉴，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

《论十大关系》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即：（1）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2）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3）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4）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5）中央和地方的关系；（6）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7）党和非党的关系；（8）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9）是非关系；（10）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在“十大关系”中前五个都是涉及经济方面的关系，实际上是在思考开辟一条与苏联有所不同的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首先探讨的是关于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问题。众所周知，苏联走的是一条以发展重工业为重心的道路，它以牺牲农业和轻工业为代价。苏联“一五”计划执行的结果，生产资料的生产增长273%，消费资料的生产只增长156%。到“二五”计划结束时，轻工业年增长率为14.8%，重工业年增长率为19%，轻重工业比例进一步失调。至于粮食生产，情况就更加严重了。到“五五”计划前三年（1951—1953），农业计划指标一项也没有完成。1933年到1940年，粮食产量低于1913年的水平。而1939年到1953年，几乎所有农作物

^①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1959年12月—1960年2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

^②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4页。

的年平均产量都低于 1913 年。如果按人均粮食产量计算，1953 年比 1913 年要低 10%。毛泽东对苏联这种片面发展重工业，排挤轻工业和农业的畸形工业化道路提出了批评。他指出：苏联和东欧国家“片面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而中国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做得好些。”因为“我们一直抓了农业，发展了农业，相当地保证了工业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通过对苏联和中国发展工业的这两种办法的比较，并鉴于苏联和东欧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教训，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对“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要加重一点。”他还提出，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的生活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在这两种办法中，毛泽东赞成后一种办法。

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上，强调要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有更大的进步。在关于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同样借鉴了苏联的教训，开始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毛泽东指出：“鉴于苏联的教训，请同志们想一想我们党的历史，以便适当地来解决这个分权、集权的问题。”^①他认为，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一矛盾，“目前迫切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关于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

^①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1956 年 4 月 28 日），《毛泽东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2 页。

者个人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强调，鉴于苏联和中国自己的经验，今后务必要更好地解决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即是说，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要兼顾各方面的利益，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不利于社会主义。

“十大关系”中后五条主要讲政治关系。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上，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巩固各民族的团结。在党和非党的关系上，毛泽东提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在我们国内，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形成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许多民主党派，现在还继续存在。“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为了同民主党派长期共事，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要团结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但是，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非有不可，而且非继续加强不可，否则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上，肯定1951年和1952年的镇压反革命是必需的，肯定现在还有反革命，但已经大为减少，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在是非关系上，强调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对犯了错误的人，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指出：“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

毛泽东在报告的最后指出：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只有这样才能把党内党外、国内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报告同时还向全党、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提出了深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

《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提出的一系列重要的思想和原则，是中国共产党

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结果，是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成果，是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之一。当然，《论十大关系》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由于中国共产党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毕竟经验不足，由于长期以来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上形成了若干不适合实际情况的固定观念，《论十大关系》在提出中国自己的建设路线时，又强调这条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①尤其是关于工业化道路问题，仍然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并没有真正突破苏联工业化模式，结果在“大跃进”运动中继续强调以重工业为中心，以钢为纲，忽视了轻工业和农业，致使市场供应紧张，日用品和粮食缺乏。

《论十大关系》在当时所产生的巨大作用是不能低估的，它向全党提出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而又艰巨的任务。毛泽东回顾这段历史，多次说过：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②后来，邓小平对《论十大关系》作出这样的评价：“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③

第二节 向现代科学进军和“双百”方针

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大批知识分子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历经千辛万苦从国外回到祖国。至1955年11月，从国外回来的高级知识分子达到1536人，其中有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如李四光、华罗庚、钱学森、邓稼先等。他们回国后，立刻投入了紧张的科研工作。

但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即将全面展开，人们开

^①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9—370页。

^② 毛泽东：《十年总结》，1960年6月18日。

^③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8页。

始越来越感到人才的匮乏，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日益显现出来。为了解决国家建设人才匮乏的问题，中国政府一方面向国外主要是向苏联派遣留学生，另一方面积极动员在国外的留学人员回国参加建设。作为共和国的总理，周恩来对知识分子及其在国家建设中的特殊作用有更多的了解，也亲身体会到了知识分子的严重不足。他多次指出，中国现有的专家不是太多了而是不够，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现在愈接触各种事实，愈使我们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① 在 1954 年和 1955 年，周恩来多次出国，目睹了国外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变化，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亚非会议上承认，中国经济和文化仍然很落后，需要长时期的建设。这不仅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而且需要一大批建设人才，包括各方面的专家。

然而，对知识分子这个十分重要而又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内部的认识并不一致。相当数量的干部还存在着不尊重知识分子的宗派主义倾向，有些干部认为，“生产靠工人，技术靠苏联专家”，还有些干部甚至对知识分子抱有一种盲目排斥的心理。

1955 年下半年，中共中央统战部曾委托民主同盟了解高级知识分子的情况。民盟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作了一些调查，获得了一大批第一手材料。统战部经过研究，将党在知识分子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归纳为六个方面：（1）估计不足，包括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进步和业务水平都估计不足；（2）信任不够，应该给知识分子看的材料却让他们看；（3）安排不妥；（4）使用不当；（5）待遇不公；（6）帮助不够。^② 11 月 22 日，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反映知识分子受伤害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它危及中国的进步”，所以，他准备在全国政协委员会召开会议的时候讨论一下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表示赞同，认为应该“先在党内很好地讨论，提出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③。

1955 年 11 月 23 日，毛泽东召集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开会，讨论知识分子问题，决定在 1956 年 1 月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全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6 页。

^②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36 页。

^③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37 页。

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并成立由周恩来负责，彭真、陈毅、李维汉、徐冰、张际春、安子文、周扬、胡乔木、钱俊瑞参加的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十人小组，下设办公室进行会议的筹备工作。

随后，周恩来对知识分子问题作了一些调查。11月24日，周恩来邀请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医学院等单位的有关人员进行座谈，了解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知识分子的现状。他要求各地向中央递交的报告应该包括最近几年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执行情况、对知识分子队伍变化的基本估计以及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意见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当天，他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会议上讲了知识分子问题，强调了知识分子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同时也指出了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估计不足，信任不够，安排不妥，使用不当，待遇不公，帮助不够”的问题，这需要我们“很好地分析和解决”。他指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是热爱社会主义中国的，在工作上是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并取得了很大成绩的。对知识分子要坚持用而不疑，给予信任。“信任的中心问题，就是我们要尊重这些知识分子。只在口头上尊重不行，而是应该尊重他们的知识，要恰当地使用他们，尤其要向他们学习，使他们能够心情舒畅地运用自己的知识。”^①他要求各地仿效中央那样成立一个领导小组，这样就“可以上下通气，收集资料，研究问题，便于党领导这项工作”，并建议各地在12月下旬召开一次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高等院校等部门的负责同志都应该参加。^②11月25日，周恩来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议上强调说，知识分子当中，大多数是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我们需要他们为社会主义服务，我们要加重他们的责任，提高他们的能力。这个问题在这个时候提出来是完全合适的，很值得我们研究，并给予全面的解决。^③同时，他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用什么样的标准衡量知识分子，这是关系到能否正确估计知识分子现状的关键所在。他认为应着重考虑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表现，在这方面的

^①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19—520页。

^②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38—239页。

^③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22页。

衡量标准首先应当是爱国主义，其次才是属于世界观范畴的马克思主义。

12月16日，中共中央下发经周恩来改定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向各地征求意见。《指示》肯定了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状况，较之全国解放以前和解放初期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同时也指出了党内在知识分子问题上还存在偏差：对于知识分子的政治变化估计不足，不按照他们的实际工作和政治立场把他们看做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不了解工人、农民、劳动知识分子的亲密联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同他们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隔阂。对此，《指示》强调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的艰巨任务，每一项工作愈来愈多地依靠科学、文化和技术，也就是愈来愈多地依靠高级知识分子的积极参加。必须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使我国的科学文化技术尽可能迅速地脱离落后状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为了从理论上解决知识分子问题，11月30日，周恩来起草了《知识分子问题》提纲，并审定了《关于收集知识分子问题材料的题目单》，要求十人小组就知识分子政治和业务状况的估计、对知识分子的信任程度等问题，整理出更加系统的研究材料。12月17日、19日，周恩来两次约胡乔木讨论有关知识分子问题报告的起草，他还就报告的指导思想、结构、内容等提出建议。1956年1月6日，周恩来召集十人小组讨论修改报告草稿。他本人对报告又作了极为细致的修改，还加上了这样一些话：“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在目前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的高潮当中，需要我们加强领导，迅速地克服这些缺点，才能更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我们应该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培养出大批的坚决为社会主义奋斗的红色专家”。^① 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十人领导小组还起草了《关于科学家研究工作条件问题的情况和意见》、《关于解决在党外科学家、教授、医生、作家、艺术家中一部分人社会活动过多和兼职过多问题的意见》、《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意见》、《关于从资本主义国家回国留学生工作分配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问题的

^①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40—242页。